

祖国在我心中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魂系中华

主 编 王月宗
李新芝
编 委 丁 胜
王 军
古爱忠
郑建华

知 识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88 号

责任编辑:陈红军

封面设计:童行侃

责任校对:余景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系中/王月宗,李新芝主编.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11

(祖国在我心中: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ISBN 7-5015-1177-2

I. 魂… I. ①王…②李… II. 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读物

IV. G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2381 号

《祖国在我心中》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魂系中华

王月宗 李新芝 主编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字数 133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6 次印刷

35001-4100 册

ISBN 7-5015-1177-2/G · 456

定价:6.00 元

目 录

临危不惧 国母风范

- 抗日战争中的宋庆龄…………… (1)

一生苦斗 牺牲为国

- 孙文主义的忠实信徒廖仲恺…………… (12)

妇女运动先驱

- 中国妇女运动奠基人邓颖超…………… (21)

报国未肯让须眉

- 鉴湖女侠秋瑾…………… (30)

不屈不挠 可敬可佩

- 民主斗士闻一多…………… (37)

为抗战发出怒吼 为大众谱出呼声

-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48)

以身报国 永示典范

- 抗日英雄杨靖宇…………… (58)

母子两代英雄

- 马本斋和他的母亲…………… (67)

云水襟怀 松柏气节

- 爱国将领续范亭…………… (75)

铁肩担道义 辣手著文章

- 爱国报人邵飘萍…………… (81)

功烈永垂民族史

- 格达活佛 (89)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 侨魂陈嘉庚 (95)

智慧的辉煌

- 一代才女林徽因 (102)

为了祖国的尊严

- 外交活动家伍修权 (111)

中国人的骄傲

-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121)

我离不开科学 更离不开祖国

- 力学大师钱伟长 (130)

生命的天使

- 妇产科专家林巧稚 (141)

一生心系祖国黄河

- 治黄专家张含英 (149)

光荣的历程

- 爱国艺人常香玉 (158)

点燃智慧之火

- 卓越科学家杨振宁 (164)

对祖国永远无私奉献

- 超级富豪李嘉诚 (172)

功在“五连冠”

- “铁榔头”郎平 (181)

体坛尖兵 军旅骄子

- 速滑名将叶乔波 (190)

临危不惧 国母风范

——抗日战争中的宋庆龄

30年代初，中国东北已笼罩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武装入侵的阴霾之中。此时，宋庆龄为奔母丧由法国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奉命不战而退，大好河山东北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举国上下，民心悲愤。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突袭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公开扬言48小时内占领上海。十九路军官兵义愤难耐，毅然抗命，奋起还击，抗击日军，并通电全国：我们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卫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守土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当时在上海的宋庆龄深为十九路军捍卫国土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她立即着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支援十九路军，亲身投入到抗日卫国斗争的战火中。

淞沪之战的第二天，宋庆龄就与她的亲密战友何香凝一起商量如何支援抗日将士。第三天，她们就带着满卡车的慰劳品，在严寒中，冒着枪林弹雨到市郊真如和吴淞前线慰问正在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官兵。宋庆龄在炮火隆隆的阵地上，满怀深情地对抗日将士们说：“亿万同胞支援你们，支持你们。”在枪弹横飞的激烈的战斗中，宋庆龄镇定自若，她抱起

一块弹片，请记者拍照，以表示她与十九路军官兵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此后，宋庆龄又两次巡视前沿阵地。

2月12日，当吴淞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她又赶到吴淞。空中的敌机不停地向地面扫射。宋庆龄轻蔑地望着空中的敌机，镇定地和官兵、记者畅谈。宋庆龄赞扬守卫吴淞部队之功极伟，鼓励他们“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寸土入于敌之手”。宋庆龄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吴淞守卫官兵，他们表示：“以卫土之责”，“使敌人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

宋庆龄在前线巡视，目睹十九路军官兵伤亡颇重，急待救护，于是她立即着手筹划，在她和何香凝的共同主持和组织下，短时间内就开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和救护队。

3月，十九路军抗敌苦战已一月，伤员甚多，而部队缺医少药，已有的伤兵医院又十分分散。为了使伤员得到治疗和护理，使伤兵救护工作有一个持久集中的组织，宋庆龄与何香凝一同筹划，在杨杏佛的竭力帮助下，由各界捐赠，在交通大学开办了一所有300多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宋庆龄亲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在国母的崇高声望和爱国精神感召下，大批中西名医云集医院；许多妇女、青年参加护理；海内外同胞踊跃捐献，慰劳品源源不断；全体医务人员日夜紧张地工作，不取分文报酬。宋庆龄经常到医院处理日常事务；到病房慰问伤员；穿上白大褂为伤员服务；她还为伤员购置唱机和他们爱听的广东乐曲的唱片，供他们娱乐。负伤官兵感动不已，一致要求早日返回前线，继续杀敌。

宋庆龄在医院接受了中外记者采访，她向新闻界高度赞扬了奋起抵抗的十九路军，她说：“十九路军卫国抗敌之忠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他们“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

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而对她亲自创办医院救护伤员，却自谦为“仅站在民众一分子之地位，对空前之革命战士表示敬仰感谢而已”，是“自应各尽绵薄。”

为了更有力地支援抗战，宋庆龄积极向海内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呼吁援助。2月，她代表反帝大同盟向高尔基及全世界进步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发出电报，呼吁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得到了罗曼·罗兰、巴比塞、高尔基等著名反战人士的响应。高尔基于3月2日在《消息报》上发表《响应孙夫人宋庆龄的呼吁》一文，指出：“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有力地说出：‘不准干涉中国！’——能够更加有力地证实，这并不是一句空话。”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团体，也开展了积极的支前工作。

在宋庆龄以及各界人士的努力下，淞沪抗战以来，海内外同胞为十九路军捐献的款项，就达700余万元。

在淞沪抗战的日子里，宋庆龄爱国爱民，不屈不挠，始终站在民族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了宋庆龄的事迹后，万分敬佩，曾写道：“孙先生之宋夫人，德才如玉，刚强正直，爱国义勇，不畏强暴，……她是一位敢死之救国女杰。”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步步紧逼，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火焰日益高涨。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后，

又在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宋庆龄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抗日救国主张，以她的特殊身份和崇高威望，不辞劳苦地为国共合作的再次实现，为共同抗日而奔走呼号，尽心竭力。

蒋介石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仅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也遭到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内爱国官兵的反对。宋庆龄为了敦促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联共抗日，她在孙中山诞辰7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大声呼吁“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1936年，上海各界群众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举行了“九·一八”纪念碑奠基典礼，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宋庆龄立即联络何香凝，在当天报纸上公开事件真相，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对群众救亡运动的残暴镇压，严正要求当局“严办负责官吏，抚慰受伤人民，释放被捕诸人，以安人心。”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以宋庆龄等人为执行委员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立即联合其他17个救亡团体，于事变当日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

1937年2月15日，宋庆龄出人意料地出席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这是自10年前大革命失败并在1931年她宣布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死亡以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在这次会上，以宋庆龄为首的爱国人士，与以汪精卫为

首的亲日投降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宋庆龄牵头，联络了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3人，联名向全会提交了“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提案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呼吁国民党“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这一正义呼声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粗暴的压制，提案未获通过，国民党还禁止各报刊登。

为了明确阐述自己的政治态度，2月18日，宋庆龄作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讲演。严厉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抗日必先剿共”的荒谬主张，她大声疾呼：“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国防。”她强烈要求国民党必须忠实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停止反共内战，有效地实行孙中山的三大基本政策。宋庆龄的浩然正气深深地打动了与会的人们。经过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激烈斗争，终于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3月下旬，蒋介石秘密请周恩来到杭州，两党开始谈判。

宋庆龄对国共两党谈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她利用各种方式，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敦促早日实现两党合作。终于，在1937年9月22日、23日先后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和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这就宣告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宋庆龄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终于实现感到异常的兴奋，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她连续写出了《国共统一运动感

言》、《两个十月》、《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等文章，抚今忆昔，感慨万分。宋庆龄写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国共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日寇进攻卢沟桥，制造了“七·七事变”。8月13日又大举进攻上海，中国驻军英勇抵抗，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帷幕。宋庆龄同上海人民一起又投身于空前壮烈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救亡运动。她为动员民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包办统制政策作出了很大努力。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宋庆龄积极发动组织上海妇女界救亡团体，支持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工作；帮助国民政府募集公债。

为应付巨大的战争开支，国民党当局于9月1日起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为推动公债的募集工作，在上海成立了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宋庆龄担任了该会的常务委员。上海的工、商、妇各界均成立了劝募分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募集活动。以宋庆龄为理事的“妇慰分会”提议，把9月5日作为上海妇女首次“献金”的日子。那一天，各妇女救亡团体的代表都到上海女子银行，踊跃献金购救国公债。在很短的时间里，仅“妇慰分会”的常委们就认购救国公债2.3万余元。当时，新婚夫妇损献戒指、小孩拿出零用钱、老婆婆取出珍藏多年的首饰是常见之事，更有无数的普通市民你一元我二元，涓滴汇成巨流。救国公债的认购活动顺利地开展起来。

“八·一三”后，国民党当局虽然转向了抗日，但又采取

种种措施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英、美国家也在“中立”、“不干涉”的借口下，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一再回避，一再退让。宋庆龄多次发表文章和谈话，严肃批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阐述动员民众投入救亡抗日运动的重要性；愤怒控诉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批评英、美政府对于中日战争采取的所谓“中立”、“不干涉”政策，呼吁英、美人民积极援助中国的抗战，共同反抗世界法西斯侵略。

她尖锐地指出：“有人以为中国要免受日本的侵略可不必唤起民众运动，这种想法是很愚蠢的。”她沉痛地分析了日本侵略者能在中国猖狂进逼的症结所在，她说：“中国为什么贫穷，日本为什么能够在中国领土内横行？”“扼要说来，十年来我们中国的虚弱无力，是由于内部的摩擦与自相残杀所致。”“自相残杀的结果，使国家受到破坏，人民大众的生活日陷贫困，因此日本才能够攫取我们东北三省，再继续侵略我们的土地。”她坚定地认为，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将成为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日本军阀只能发抖。”

她多次致函英国政府，陈说中国为捍卫民族生存而殊死奋斗的情况，呼吁英国政府切实援华，制止日本摧毁人类文明的野蛮行径。

她致电美国总工会，呼吁美国工人抵制往日本运送军火。她明确指出：日本对华的种种侵略行径，也包含着对于美国本身的威胁。她向美国人民提出：请你们不要让任何一只船从美国开往日本去，因为日本可以把你们的任何出产物加以改造，来对付我们。她最后呼吁：趁残酷的火焰尚未延烧到全世界各国之前，将它扑灭。

她充满信心地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坚决捍卫民族生存的决心：“我敢代替全中国人民坚定地告诉你们，日本军阀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中国人民都准备以最后的牺牲，来保卫祖国。”

上海沦陷前后，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把宋庆龄在“八·一三”前后发表的演讲和文章汇编出版，取书名《中国不亡论》。这本书给“孤岛”中的上海人民以坚持抗日救亡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使人们坚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1937年11月以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并支持抵御日本侵略军的民族斗争，宋庆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于12月23日离开上海，移居香港。

为了争取更多国际友人的援助，以支持浴血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宋庆龄一到香港，就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商议，准备建立一个专门组织。经过紧张筹备，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于1938年6月14日在宋庆龄寓所宣告成立。

“保盟”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在宋庆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了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参加了反抗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的斗争。“保盟”不仅争取了广泛的国际援助，而且也争取了广大爱国侨胞的援助。“保盟”的主要任务是架起需要者和资金、物资捐赠者之间的桥梁，一方面让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质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

宋庆龄在主持“保盟”的工作中，始终坚持“保盟”的宗旨和原则立场。她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斗争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她说：“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其中一个公开的战场。”“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因此，在“需要者”和“捐赠者”之间，是互相帮助的国际主义关系，而绝不是“乞求”和“施舍”的关系。宋庆龄还一再强调“保盟”所从事的救济工作，是为了有效地支援抗日。她说：“‘保盟’不是中立的，它在各地帮助中国的战斗”，“只要那里能加强中国人民的抗战，它的救济就用在那个地方。”

从“保盟”收到的来自各地的申请援助材料中反映出，最缺乏资金和医疗等物资的是游击区。“保盟”先后发起了“两万条毛毯运动”和“一碗饭运动”。

1939年5月，“保盟”为新四军游击队伤病员募集毯子的呼声飞洋过海传到了世界各地。呼吁说：“请立即给长江流域的游击队送去2万条毛毯”，“1938年冬天，那些为保卫你们的自由以及他们的自由而受伤的士兵中，每1000人就有10个由于挨冻而死。”许多国外机构和个人直接送来毛毯和寒衣，一些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也捐助了毛毯和资金。2万条毛毯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1941年7~8月，“一碗饭运动”达到了高潮。这次募捐的做法是：成立一个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委员会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2万元，持券者可到指定的餐室吃炒饭一碗，参加赞助的饭店、酒家、茶室提供炒饭，并将全部活动的收入捐赠给抗战。

7月1日晚，宋庆龄在香港英京酒家举行规模盛大的“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宋庆龄发表演说，呼吁：“尽自己的努

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浴血奋战的抗日军民。”并将她珍藏的孙中山的墨宝及其他文物和纪念品，当场义卖。

“一碗饭运动”轰动了香港。宋庆龄在《华商报》上亲笔题词：“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报纸刊出了特辑；各饭店门前张贴着“欢迎来吃爱国饭”的标语，有的挂上醒目的“爱国之门”的横幅；公共汽车上挂着“为祖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等标语和宣传画。工、商、妇、学等团体协助推销餐券。人们走上街头，以能吃到这一碗“爱国饭”为荣。9月1日举行闭幕典礼，宋庆龄将亲笔书写的“爱国模范”的奖旗和纪念品送给热心运动的单位和个人。“一碗饭运动”获得了圆满成功，共得捐款2.5亿元港币。

随着抗日斗争的激烈开展，伤病人数增加，根据地和前线缺医少药的问题日趋严重：没有最基本的医疗设备，缺乏药物，缺少医生和护士，进行外科手术所需的消毒用品只有水、火和盐。在宋庆龄和“保盟”的帮助下，于1938年在晋察冀边区成立了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为第一任院长。后来，在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倡议下，又在各根据地设立了分院。“保盟”先后向国际和平医院派去了大量的医务人员，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和医疗设备、药品、疫苗、绷带、衣物、毯子等。

1941年12月，香港濒临沦陷，宋庆龄在硝烟弥漫中撤离香港，飞往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临行前，她坚定地表示：“不管在哪儿，我们也一定要重建我们的‘保盟’。‘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

重庆，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宋庆龄冲破山城的沉寂，领导“保盟”继续行动。大笔的捐款，大批的物资克服重重困难，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根据地，现在陈列在北京

宋庆龄故居的展览室里的大型 X 光机，就是 1944 年由国外捐献，在史迪威将军的帮助下运往延安的。这是当时拥有 9000 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台大型 X 光机。

在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无论是在上海、香港，还是在重庆，始终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决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动与扩大，呕心沥血，顽强奋斗，贡献了她巨大的力量。她的业绩和精神，饮誉中外，永垂青史。



一生苦斗 牺牲为国

——孙文主义的忠实信徒廖仲恺

廖仲恺，原名恩煦，广东惠阳人。1877年4月23日出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庭。当年，父亲廖竹宾因家境贫寒，背井离乡，在香港被人贩子骗卖到美国当华工。先是淘金，后来在汇丰银行当职员，慢慢地攒了些钱，就自己经营商业。

那时，华侨生活在当地社会最底层，备受歧视和欺凌，生存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1877年，也就是廖仲恺出生的那一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随即美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同意限制华工的条约，通过了排华法律，于是，激烈的排华浪潮遍及全美各地。流氓、无赖之徒到处寻衅，迫害华人的惨案到处发生。廖仲恺一家居住的旧金山，排华活动最为猖獗。廖仲恺开始懂事以后，父母亲就经常给他讲述华工、华侨遭受迫害的悲惨遭遇。他也目睹华人遭受当地人歧视、欺凌的情景。帝国主义的凶残，祖国的孱弱，中国人在海外毫无地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他未曾见过自己的祖国，但他思念祖国，爱国思想由此萌发。

廖仲恺开始读书了，父亲对他说：“我们虽然住在美国，应该学习英语，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中国人，对祖国的文字更应该学习精通。随便哪个人都得懂自己祖国的文字。祖国是每个人灵魂和生命的寄托，灵魂没有寄托的人、生命没有寄托的人，就像树叶离开树枝一样，失去了营养的供给，便

会焦枯而死的。所以我们要爱护自己的祖国，就像爱护我们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生命一样。能够不忘记祖国，不忘记祖国的文字，这就是爱护祖国的第一个条件。”廖仲恺铭记着父亲的教诲，他在美国学校上学的同时，还进私塾攻读中文，同时掌握了汉语和英语的基础知识。

1893年，父亲病故，廖仲恺陪同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到了祖国。

1897年，廖仲恺与何香凝女士在广州结婚。两人的结合，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呢。

何香凝出身于一个大地产商家庭。封建的家庭，不允许女孩子读书，而要女孩子缠足。何香凝从小就有男孩子一样好胜的性格，不让进书馆，她就发愤自学，遇到不懂的字，就叫女佣人到私塾教师那里去请教。她从亲戚和长辈们那里听到太平天国的女战士们都是天足，非常憧憬。她讨厌缠足，白天被缠，晚上就将缠足布剪掉，表示反抗。剪刀被收去，她就再买一把，藏在祭祖的香炉下面，等大家都睡熟后，再将缠足的布剪掉。屡缠屡剪，始终不屈。母亲只好随她了。

廖仲恺的父亲在去世前曾留下遗嘱：小脚女人在外国被人看不起，按客家人的规矩，儿子必须讨个大脚妇女作媳妇。在当时的中国，大脚妇女实在难找。何香凝的天足，成全了廖仲恺。两人没有经过自由恋爱，顺利地结成一对美满夫妻。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1901年《辛丑条约》出卖了国家的大量主权。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反抗四起。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纷纷寻求救国之路，他们到国外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出洋留学之风盛极一时。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廖仲恺萌生了